

□ 孟繁华

读杨黎光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这究竟属于哪个学科或文体的著作。它是文学随笔、哲学札记抑或是心灵体验的讲述，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著作与我们每个人有关，与我们切实的心理经验或精神状况有关。因此，这是一本关怀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著作，是一本对生命或生活本质进行终极追问的著作，是一本融汇了古今中外知识和个人经验的著作，也是一本既形上玄想又驻足大地的著作。阅读这样的著作不仅趣味盎然，同时给人无尽的启发、联想，然后是叹为观止。

之所以难以确认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就在于，杨黎光在书中不仅信马由缰旁征博引，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用了大量统计数字，采用了大量的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具体心理经验。他的文字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像鸽哨如云朵，但那些具体的实例又因如此贴切而让人倍感亲切。开篇作者就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材料：国外一家机构搞了一项世界各民族快乐指标研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二个国家总共两万多人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美国 46% 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英国 36%，印度 37%，而中国只有 9% 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反过来说，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九个认为自己不快乐。于是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杨黎光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感到不快乐？这不仅是个问题，而且是每个人都不能摆脱和回避的问题。因此，为大家“寻找‘快乐共识’”，就是这本书写作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杨黎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出版

我们注意。但是，就是这些事务，决定着我们是否快乐。我敬佩的是，杨黎光通过这些表面事务，走进了它的深处。他不可能给我们终极答案，但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却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匆忙抑或迷茫的不知所终的黑暗的隧道，他启发我们在琐屑或无尽的事务中，能够停歇下来——这都是为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问题的提出当然不是始于杨黎光。远处不说，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潘晓的一封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当年 23 岁的潘晓说，“我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这种失望、绝望感，本质不就是缘于不快乐吗？因此，杨黎光的书写或思考，是一个接续性的追问，也是一个发展性的研究。杨黎光注意到，就在前两年的《中国青年报》上，年届八十的经济学家茅于軾发表了题为《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开篇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少人懵懵懂懂过了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相信没想过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当然，茅于軾先生讨论得更具体，他说：“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往往和他周围所处的环境有关。所谓的环境主要是人的环境。如果没有人跟他捣乱，他就会活得快乐一些。反之如果人人和他过不去，找他的毛病，污蔑他，侮辱他……他自己再有本事，再懂得怎么追求快乐，也都没有用。所以说一个人快不快乐不光与自己懂不懂快乐有关，更与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有关。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光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一个阅历丰富的学者的切身感受。

杨黎光是一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如果说多年来他的作品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变革，密切关注现实生活的话，那么，这部《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则将他的视野拓展到了关怀人的精神和心灵领域。这个变化让我们认识了另一个杨黎光：一个敢于面对和走进人类心灵世界的杨黎光。

《重新发现社会》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我看看你的美丽与忧愁》
孟昌明 著
文汇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出版

【书香灯影】

真相·常识·担当

□ 周鲁霞

即使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大师大德们也总是会灵犀相通。比如黑格尔提出了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墨子提出了达名、类名与私名，荀子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与个体名，而卢梭提出了公意、众意与私意。简而言之，在卢梭的笔下，私意是单个人的意愿，众意是一部分人意愿，公意则是公共的意愿。对公意、众意与私意作理论上的区分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寻找到公意或者把公意实现。

就一个问题达成一致，无论如何首要的是搞清楚问题的真相。真相永远是寻找公意或真理的起跑线，是改变认识、改变世界的起点。因此，现代化民主社会十分注重对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二战期间，美国加强新闻管制，记者的权利受到约束，战争结束后，美国记者肯特·库柏在演讲中首次提出“知情权”概念。194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59 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2009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 年)》，这是我国首次发布人权行动计划，并首次把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提出。当下，我们常讲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所以把知情权放在第一位，因为知情是基础和关键，只有知情，才能参与、表达和监督。法律对知情权的保护，无非是为了保证真相较为完整地呈现。

寻找公意离不开常识。与夏虫不可言冰，因为夏虫秋天即死去根本见不到冰。理性的对话基于共同的常识，常识匮乏的时代，人们必定无法顺畅对话，无法顺畅对话也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常识匮乏对发现公意是一个阻碍，后果是只有私意、众意，既坐不到一起，也说不出一块儿，如果有所谓的公意也不过是假公意之名罢了。这是一种既混乱又可怕的局面！常识匮乏意味着启蒙远没有结束，所以我们需要启蒙，需要向民众传输普世价值和学术通识。

启蒙从来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不仅拥有知识，知道常识，而且是“爱管闲事的人”（萨特）。如果“爱管闲事的人”不想管那些“闲事”怎么办？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寻找公意与其说需要启蒙，需要知识分子，不如说需要同情、责任或担当。2010 年 6 月，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中国讲学时说：“对欧洲知识分子来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面对的敌人好像越来越少。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前的最后几场讲演中说过，自由要想有实质内容和意义，就不能空洞化。自由永远意味着一种相遇，一场决斗，是要去战胜对方，所以需要遇到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障碍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对于知识分子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转型中的社会必定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对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却正是一种机遇、一个舞台！

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自 2010 年 1 月出版以来，年内加印七次，并陆续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新浪“中国好书榜”十大好书奖、“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等奖项。从学术角度讲，以国家与社会为范式剖析由传统到现代转换中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作为一名普遍意义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熊培云确实触摸到了关键，他告诉了我们真相和常识，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这，已经足够了。

【艺术空间】

他与他的笔 在想象的乌托邦

□ 倪端

拉赫曼尼诺夫为开创事业第二春，在纽约写出《第三号钢琴协奏曲》。我看昌明集结所有的“美丽与忧愁”，字字句句应是为了更走近理想中的香格里拉而生。

阅读昌明的文章，望似具象，实则虚拟；与我阅读他的书画有完全不同的心境。就如同简单音符，并不代表演奏的难度低下。昌明的水墨书画不用繁复线条，在行云流水间另有豁然开朗的新意气象。而他的文字，无论短篇长文，却是必须随着理性丈量，亦步亦趋进入他的感性节奏，再拉出情丝万缕；不明就里的人直接看文全然无碍，明白故事后阅读者其实和他一样耗费许多精神。

《我看看你的美丽与忧愁》从东方到西方，从传统到现代，左手是诗篇，右手是小调；从目录排除看昌明学习企图与深刻反思的路径，可以了解他一贯“植栽耕种”辛勤务实的心理状态。他是一个端正四方爱憎分明的人，一个会牢牢记得细节过程的人，一个顽强执著毫厘不让的人，一个多愁善感用心生活的人。

他与我有么不同。我们虽出生在同一个年代，却成长在截然不同的背景环境中。他对生活的认真态度与自我要求，成就他势必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艺术家。他擅长记忆深厚情感，所以他的文字绝非表面上铺成那般直接，而是再三咀嚼后的细腻编织。他的文字总不经意地指向遥远，这距离有相当深沉的孤寂。我想，他恐怕亦未意识到这一层吧。

昌明不是天才写手，他是用心写作的高手。因为他讲结构与刻度，字里行间有故事线条，文章有丰富变化色彩，你无法在他未断章句时停歇。阅读他的文章，很难随性随意，你必须一气呵成。

除了对绘画情事的描写抒发，我特别喜欢他的人物速写与生活笔记，人间多情短小有味，虚实之间令人疑猜。你可以看到他正气凛然外，侠骨柔情诙谐幽默的一面，以及人情世故下无伤大雅的小小乡愿（这点，他肯定不承认）。他的一字一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感动人的热忱。

面对世俗的欢愉，当然比不上仙境的自在。这位天涯游子，始终在纸笔间不断尝试找回原乡的渴望。于篇章文章中，他对良善讴歌，也显露了对人事的至情至性。

有一天，他会发现他的笔，在文字中所创造的境域，对许多人而言，不再是神秘的冒险，而是乌托邦“梦到天涯即是家乡”的真实与美善。



@必读呢本：《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桑塔格讨论过死亡与痛苦，其睿智与尖锐让人印象深刻，可谓“死亡大师”。可死亡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睿智如桑塔格者，也不能例外。看到书中桑塔格对死亡的恐惧和不甘，令人心酸，再坚强的人，在死亡面前也无能为力。这是真实的桑塔格，一个肉身必死的人。

@黄老邪：《我与北野武》，岛田洋七著。这本书的调调我喜欢，是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调调，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调调。更喜欢的是岛田落败后一歇歇七年，真潇洒。我一直问自己，敢吗？有木有？有木有？有木有？结论如你所知。这也是学不来的，是世界观也是生命观。放弃，有时比我们想象的美好得多。

@毛丹青：世界读书日谈读书，坐在我对面的是日本国宝级电影导演山田洋次，他说读书也是读风景的一种，起先拍电影《寅次郎的故事》时老找不到好的外景地，后来才发现自己从小长在中国的一段时间把开阔的风景注入了记忆，所以在日本很难找到与内心相符的印象。为了找风景，他读了很多书。

@谭山山：《1Q84 3》结局当然是青豆和天吾重逢，回到 1984 年。Book 3 的全部使命不就是这样吗？但太顺当了，反而令人怀疑：他们回到真的是 1984 年吗？还是另一个次元的 1984？小小人会跟着他们回去吗？得有续篇或前传吧？村上的回答是：说不好，可能会写，可能不会写。您老不写，会有手贱的人忍不住的。